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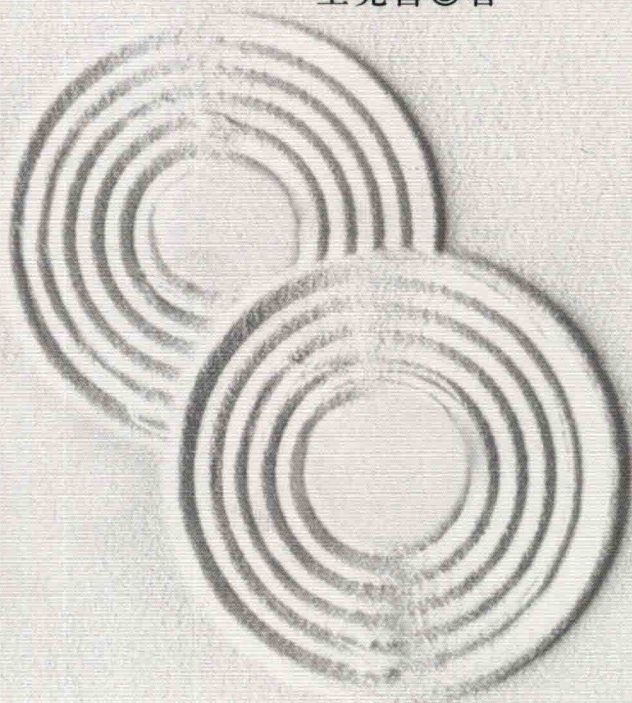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 第二辑

张建军◎主编

中国逻辑的汉语视界

王克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 第三辑

张建军◎主编

中国逻辑的汉语视界

王克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逻辑的汉语视界 / 王克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7-5203-4264-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汉语—关系—逻辑—研究—中国
IV. ①H1②B8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121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郝美娜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09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序言

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科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著名学者刘伯明、汤用彤、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胡世华、何兆清、王宪钧、陈康、倪青原、殷海光等曾在原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即其前身）和金陵大学哲学系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数学系莫绍揆等著名数理逻辑专家也长期关心与支持哲学系逻辑学科的发展。1960年南京大学恢复哲学专业之际即设立了逻辑学教研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2年获得逻辑学硕士学位授权以来，南大逻辑学科获得了长足发展。2001年开始招收逻辑学方向博士生，2003年获得逻辑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以本专业为主体设立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作为哲学一级学科重要分支学科，2008年入选江苏省重点学科；2011年入选江苏省优势学科工程；2017年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工程。自1960年以来，先后在南京大学哲学学科从事逻辑学教学工作的有林仁栋、郁慕镛、李廉、李志才、郑毓信、吕植壮、王义、张建军、蔡仲、杜国平、王克喜、潘天群、顿新国、陶孝云、张力锋、袁永锋。亦曾聘请美国学者 R. C. Koons，澳大利亚学者 G. Priest，日本学者金子守，法国学者 O. Brenifier，挪威学者 O. Asheim，台湾地区学者刘福增、王文方等开设长短期逻辑课程。逻辑学位点设立以来，李廉、李志才、郁慕镛、张建军先后担任学科带头人。先后担任逻辑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的有李廉、李志才、郁慕镛、张建军、杜国平、王克喜、潘天群、顿新国、张力锋；先后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有张建军、潘天群、王克喜、顿新国、张力锋。迄今逻辑学专业共授予硕士学位110人（含美国留学生1人）；授予博士学位50人。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17人，在读博士研究生21人（含香港留学生1人）。逻辑学专业亦接受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研究人员，已出站9人。人才培养成绩显著，硕士、博士

毕业生和博士后出站人员中已有一批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活跃于学术界。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毕业生也以较强的理论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实际工作能力获得了广泛好评。

多年来，南大逻辑学科同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敬业精神从事逻辑教育工作。在哲学专业本科逻辑教学，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教学，全校逻辑通识课、文化素质课教学，以及多层次逻辑教育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与此同时，本学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师生的逻辑理论与应用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得到海内外学界广泛好评。特别是“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成立以来，本学科适应当代逻辑科学发展趋势，致力于组织专兼职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展开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多视角交叉互动研究，设立了六大主要攻关领域：1. 现代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研究；2. 逻辑与哲学的交叉互动研究（含逻辑哲学、辩证逻辑研究）；3. 逻辑与科学方法论（含人文社科方法论）的交叉互动研究；4. 逻辑与认知科学及人工智能的交叉互动研究；5. 逻辑与语言学的交叉互动研究（含非形式论证研究）；6. 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多层次逻辑教学现代化研究。近年又开拓出“思想分析与哲学践行”的研究方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都取得了诸多新的进展，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学风严谨、富有活力的学术团队，国内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研究方向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学科整体水平在国内同学科中位居前列。

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成立以来，逻辑学科专职教师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1 项（含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各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含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2 项），中央军委科技委前沿创新项目 1 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国家和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12 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国家社科规划办表彰 1 项，获“金岳霖学术奖”4 项，获教育部、江苏省和中国逻辑学会优秀成果奖励 15 项；张建军入选中央“马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杜国平、王克喜、顿新国先后入选课题组主要成员，潘天群、顿新国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张力锋入选江苏省“三三三工程”培养对象；张建军获南京大学“人文研究贡献奖”，顿新国、袁永锋、张力锋先后获南京大学“人文研究青年原创奖”。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旨在展示南大逻辑学科的研究特色及系列成果，以与海内外学界及广大读者交流。首批书目四册为南大逻辑学科时任四位专任教授的论文自选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第二批书目四册为本学科三部代表性专著和一部论文选集。各部著作的内容简介见作者所写“后记”。请学界同人与识者继续予以关注，并欢迎展开交流、切磋与合作研究。

感谢江苏省优势学科工程项目对本文丛的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春风编审和出版社同人的悉心帮助和精心审校。

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科带头人
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
张建军
2018年11月于南京

目 录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序言	(1)
第一章 逻辑与文化	(1)
一 逻辑是一种文化现象	(1)
二 逻辑对文化的影响	(3)
三 文化对逻辑的制约	(6)
四 余论	(9)
第二章 语言与思维	(11)
一 什么是语言	(11)
二 语言与思维	(15)
三 语言影响思维	(22)
第三章 中国语言与中国逻辑 (上)	(36)
一 中国语言与中国推理类型	(36)
二 汉语整体特征与中国逻辑理论和思想	(45)
三 汉语词法特征与中国逻辑理论和思想	(53)
四 汉语句法特征与中国逻辑理论和思想	(58)
第四章 中国语言与中国逻辑 (下)	(71)
一 语素音节文字	(74)
二 汉字系统	(80)
三 汉字的类比性	(83)
第五章 “是”与“to be”	(91)
一 “是”与“to be”和中西逻辑理论	(93)
二 “是”与“to be”和中西哲学	(97)

三 余论	(99)
第六章 “不”的逻辑意义	(102)
一 句尾“不”的否定范围和否定焦点	(104)
二 固定格式中的“不”的否定范围和否定焦点	(105)
三 “不”字句的否定层次与否定命题间的关系	(106)
四 “不”字否定的量项及模糊度分析	(108)
第七章 中国语言与非形式逻辑	(116)
一 古代汉语的意会性与非形式逻辑	(117)
二 汉字的意会性与非形式逻辑	(120)
三 系词“是”与非形式逻辑	(123)
四 余论	(128)
第八章 汉语中反向表达的逻辑阐释	(129)
一 词语中的反向表达	(130)
二 句子中的反向表达	(132)
三 反向表达探源	(138)
四 反向表达的辩证逻辑阐释	(140)
五 反向表达的对立统一推理	(142)
第九章 关于中国语言与中国逻辑的反思	(144)
一 中国传统逻辑推理	(144)
二 中国传统的逻辑理论与思想	(156)
三 中西逻辑的互补	(164)
四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法	(169)
第十章 中国逻辑史研究与训诂之关系	(179)
一 训诂研究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意义	(180)
二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训诂问题	(182)
三 由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训诂问题而生的断想	(187)
主要参考文献	(191)
后记	(196)

第一章 逻辑与文化

2005年1月，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学的《亚非文集》出版了《中国逻辑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逻辑研究》(*Chinese Logic and Chinese Culture—Researc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ogic*)，据我所知，这是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逻辑研究的第一部文集，表明了把逻辑与文化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方向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的学者力图把这种关注介绍到西方去。

一 逻辑是一种文化现象

国际学术界公认，世界逻辑学有三大源流，即中国名辩学、印度正理—因明和西方逻辑学。这三大逻辑源流在三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发展出来。民国时期，学者张东荪曾指出：“我现在研究了以后，乃发现逻辑是由文化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这就是说逻辑学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惟一的逻辑’(Logic as Such)，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①

纵观三大逻辑源流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印度正理—因明是建立在正统派哲学与非正统派哲学之间的论争之上的。在古代印度，国王、贵族、平民都乐于参与辩论，不论在王宫、寺院还是在街头的市井，随处可见辩论场景，正是这种的“论辩之风的盛行，论究学的发展，公允、合理的论辩精神的树立，催发了印度逻辑并一直伴随其成长，构成了

^① 张汝伦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印度逻辑的一大基本特征”。^① 作为西方逻辑学代表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也是从论辩中产生，但是由于受这一时期古希腊数学的发展的影响，“演绎证明的方法和初步公理化方法就是这个时期数学的主要成果。古希腊数学的发展为逻辑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② 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则明显地受到“百家争鸣”的影响。

在先秦，正如《管子·宙合》篇所说的那样：“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因此，正名实就成了论辩的核心，“在论辩过程中，各家要进行正面的思想交锋，要确立自己的观点，也要驳斥别人的观点，就必然要总结论辩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论辩的原则理论、方法，这就为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③ 尽管三大逻辑的产生还会受到诸如经济、政治、伦理、语言等方面的影响，即使从它们的共性——对论辩进行研究来看，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西方逻辑学与古代印度正理—因明也大相径庭。古代印度正理—因明重在无过，而西方逻辑学则重在求真。那么，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又是如何的呢？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是这样介绍的：“（1）中国古代逻辑是一个以辩论形名为开端以正名为重点，包括名、辞、说、辩为内容的名辩逻辑体系。（2）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与语言的关系特别密切。（3）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直接受到政治、伦理思想的制约。（4）中国古代逻辑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基本上一直处于哲学认识论的范围。（5）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④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⑤ 从世界公认的三大逻辑的发生发展来看，三者都是在本民族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名辩学理论的产生更纯然是一种中国式的逻辑理论和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汉民族文化特征。正如著名汉学家马赛尔·格腊内通过分析中国语言来说明中国古代思维过程

① 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② 同上书，第306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所说的那样，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三段论的爱好。^①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也指出：“若谓西方人之逻辑乃人类思想通律，不懂逻辑即无法思想。然则中国古来向无逻辑一项学向，即不啻谓中国人自始皆不会思想，抑或中国人思想皆不合逻辑。……此处正是中西文化思想的相歧点，不得厚彼薄此。”^②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对三大逻辑的产生进行分析时，指出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逻辑之间的差异：“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③由此观之，逻辑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定民族文化中思维方式孕育的结果，因而也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逻辑传统。从逻辑发展的历史来看，逻辑绝对不是一种超越文化的现象，也绝对不会仅仅是一个模式、一个体系。

二 逻辑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在广义还是在狭义的含义上都包含有众多的因素。这些众多的因素之间必然会具有联系和影响，从而构成有机的整体。包括逻辑在内的众多文化因素是系统整体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对文化的发展、演化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那么逻辑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① [罗马尼亚] 杜米特留：《逻辑史》，第34页（李廉主译，中文翻译打印稿）。

② 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③ 彭漪涟：《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首先，不同的逻辑类型对民族的科学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论及逻辑对科学的影响，我们便很自然地想到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关于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发明的一段话：“西方的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① 惊奇吗？一点也不惊奇，这就如同“几何学是希腊数学特征，而代数为中国数学的特征”^②一样，西方的演绎逻辑传统使西方的科学走上了理论科学的道路，而中国的名辩学传统则使我们的科学更多地走上了技术科学的道路。《韩诗列传》和《史记》都分别记载了楚渠子和李广在无意识状态下把箭射入石中的现象，《晋书》也记载了谢灵运梦中作诗这一情况，但是中国古人没有谁能够进一步去探讨无意识问题。在宋代，中国人就能生产“丁白磁”——一种运用光学原理和视差原理的高级工艺品。中国古人凭借直观经验和手工艺术生产了“丁白磁”，却不知其深层的内在奥妙，也没有人想从理论上去探讨它。

“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在科技领域中，有许多发明或发现是由中国人先做出来的，但中国人没有提升到理论高度，提升到理论高度的往往由西方人承当：西方人提高之后，再传入中国。”^③ 对于这一点，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李约瑟指出：“从历史看来，中国在技术上的许多发现，并未受到发现者们的宇宙观的质的影响。而且不能因为著书者的宇宙观未曾发展出伽利略与牛顿那样的科学，便使那些他鄙视的中国古籍里的经验知识的价值减低丝毫。反之，我认为适当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人关联式的思考或联想式思考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式或法制式的思想方式，在本质上根本就不同。……中国人关联式的思考绝不是原始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说，它绝非处于逻辑的混沌，以为任一事物皆可作为其他事物的原因，而让魔术师纯粹的幻想来指导人的观念。”^④

①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② [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页。

③ 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383页。

其次，逻辑与数学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了，那么逻辑对数学的发展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中如何呢？其实，西方数学的发展一直继承公理化、形式化以及证明的传统，而中国的数学的发展同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与思想一样，重视具体问题的研究，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的方法。季羨林先生在《对 21 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中指出：“后来，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有名的数学家、大数学家吴文俊教授，他给《九章算术》写了一篇序，他就讲，数学（吴文俊教授并不搞哲学，也不搞什么中西文化，他就是数学家），东方的数学与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数学从公理出发，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法：凡人必死，张三人也，故张三必死，它从公理出发。立一公理：凡人必死，凡人怎么怎么样，下面演绎。中国呢，是从问题出发，从实际出发，所以中国数学的发展，不是从公理来的，是从问题来的，是从实际来的。”^①著名的哲学家张岱年也认为：“就以数学而论，数学发展本身要求其抽象性比较高，可是中国古代数学家似乎也缺乏一种纯理论的兴趣，因而始终没有掌握纯粹靠公理为基础的证明技术，而只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应用的专门问题，比如《九章算术》，每一章解决一类问题，每一类问题采用一种方法，其中讲方田（丈量土地）、商功（工程审计）、勾股（三角形）都涉及几何学方面的问题，但它却不讲点、线、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只讲如何计算。”^②

再次，逻辑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的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17 世纪，随着唯理主义哲学流派的出现，语言学的研究出现了一股语法逻辑化潮流，研究语言的人们倾向于把一切语言的语法范畴都看成是逻辑范畴的体现。如果语言的某些现象与逻辑的公式相出入，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智而应该彻底消灭。逻辑成了语言研究的上方宝剑。1660 年出版的《唯理普遍语法》可以说是对斯考特（1266—1308）《关于普遍逻辑》一文精神的承继，该书把语法与逻辑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而在中国古代，语法学并不盛行，语言研究的思想大多体现在对古书的训诂之中，有清一代的很多训诂大家并不是以撰写了什么训诂理论专著而成名，相反，大多是因为解决了一些训诂的具体问题才名声赫赫的。1898 年

① 季羨林：《对 21 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98 年第 1 期。

② 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马氏文通》的出版，开了中国语法研究的先河，系统的语法理论使中国的语言学工作者耳目一新，这才有了中国自己的系统的语法理论。然而就是这样的系统理论的影响，也值得我们深思。

由此，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与思想对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可见一斑。

最后，逻辑对哲学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就中国现代哲学的重建而言，胡适、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借助了西方逻辑这样的工具，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推进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胡适认为，他之所以能够推出全新的中国哲学史，最核心的是借助了逻辑的工具，逻辑的工具是他的立身之宝，学问之根基。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说道：“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这个看法，我认为根本不错。”^①“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②“我四顾九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不能不深感哲学的发展受到逻辑方法的制约的影响。”^③冯友兰先生也指出：“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④金岳霖先生也认为：“如果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⑤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对逻辑方法的重视，也正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帮助冯友兰、金岳霖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形成了有特色的哲学学派，从而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极富创造的哲学家。

三 文化对逻辑的制约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逻辑，自其产生之日起就离不开文化对它的影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8、77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页。

⑤ 《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响，而“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独立产生的，也就必然地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风貌。周礼全先生指出：“逻辑所研究的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逻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逻辑。但是，另一方面，逻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总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和某些个人的产物，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因此，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①

如果我们不带有任何偏见地来看待三个逻辑传统的话，有效性只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精粹，而并不是中国逻辑传统和印度正理—因明传统的精粹，甚至可以说，中国逻辑传统和印度逻辑传统并不关心有效性的问题，而是对“辩胜”“无过”情有独钟。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受西方语言中居于金字塔之顶的系词“是”的影响：“而对于逻辑学意义上的逻辑来说，语言中直到出现了系词‘是’才可能充当具有形式意义的逻辑来说，在日常语言中纯形式地使思想通过语言保持抽象统一性。……由此可见，系词‘是’对于形式化的逻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希腊语言中没有系词‘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就无从建立。正因为古代汉语中没有系词‘是’，所以中国人始终没能建立真正具有纯形式性的逻辑体系。”^② 亚里士多德逻辑是通过研究语言中的系词“是”才得以建立的，“to be”在西方语言中作为一种基本的语言形式是西方得以发展出本体论哲学、得以发展出逻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逻辑也深受古希腊数学发展的影响，古希腊数学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依据明白规定的公理，用演绎法推出的信条，这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对“有效性”的追求提供了前提。数学史家 M. 克莱因指出：“希腊人在搞出正确的数学推理规律时就已奠定了逻辑的基础，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才能把这些规律典范化和系统化，使之形成一个独立科学。”^③ “亚里士多德把这些形式整理成绝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35 页。

② 张志伟：《是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美] M. 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上海科技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 页。

对正确的规则，因而实际上成为在数学领域之外用数学方法写出的第一个人。”^①可以说，如果没有古希腊数学的发展；就没有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出现和发展；如果没有古希腊语言中“系词”的普遍存在并对之进行研究，也同样没有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出现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古希腊文化的发展结果。

古代中国没有盘旋出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影响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正如同汉代经学家许慎对“王”的解释那样，王者，天地人一以贯之也。中国人似乎从远古开始就非常重视生生和谐。“中国人是对知天意感兴趣，以使求福避祸。至于天的本质，他们不关心。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人并不把实质的范畴用于关于天的思想，不把天当作宇宙的最终的材料。”^②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讲究“辩证理性”，不以探索世界本质、获取科学知识为基本追求，把对政治、对伦理的关注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有的研究者把中国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主体的自我中心性”，^③认为这种文化一直缺乏一种很强的外倾性，对外部世界缺乏很迫切的关注，对自然与自然的运作以及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兴趣。这种文化所带来的思维特征是“以己度物”和“想象性的类概念”，认识方式上表现为主体不是自觉地适应客观现实，而是用主观特点去改造现实；不是让主体适应客体，而是让客体适应主体，经常用表现代替再现，用一种对现实的想当然改造来代替纯客观的反映。用已知比附未知，从个别具体的对象去寻找外界事物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带有强烈的具象性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它不利于与理性与逻辑有关的所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可以说，这种文化特征就使得逻辑在中国古代始终未能独立出来，并获得充分完善的发展。也是基于对这种文化特征的分析，有的学者就认为：“中华文化中为什么没有衍生出形式逻辑？非不能也，乃不为也。”^④

① [德]亨利希·肖尔兹：《简明逻辑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9页。

② 张东荪：《中国质学家的知识论》，载于《燕京社会研究》1、2期。1939年，第178—179页。

③ 张卫中：《母语的魔障》，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④ 陈慕泽：《中华传统文化缘何未成为全球化大厦担纲之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5期，第35—38页。

四 余 论

逻辑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至少可以给我们今天的逻辑学研究提供以下启迪。

首先，逻辑学的研究要给予逻辑以历史的文化考察。罗马尼亚著名的逻辑史学家杜米特留曾经说过，逻辑就是它的历史，而逻辑史就是逻辑本身。我国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也曾经指出过研究中国逻辑史的重要意义。我们的逻辑学研究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只把逻辑发展的结果看作逻辑而忽视甚至抛弃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语言学能够区分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逻辑学的研究是否也应该作出这样的划分呢？这样也许会避免有的学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研究逻辑史有什么用”这样的惊世骇俗的话语，也许可以避免关于“什么是逻辑”的大相径庭的看法和认识了。

从发生学意义上看，逻辑的产生确实是文化催生的结果，逻辑是一种文化。亚里士多德逻辑和数理逻辑的产生是与西方的语言实际和数学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的语言实际和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思维方式的嬗变，不能或者说不愿意具有产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和数理逻辑的需要。就如同不能笼统地说数学的产生和发展超越文化一样，也不能笼统地说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是超越文化的，具有超越文化的普遍性。从文化的角度去阐释逻辑，目的不在于要取消逻辑的先存性、最高性、普遍性，而是要说明逻辑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尤其是在分析理性不发达的中国更要弘扬这种精神，因为科学理性不仅需要辩证理性，也同样需要科学理性。

其次，逻辑学的研究要找准文化切入点。逻辑学的研究必须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发挥逻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积极参与、理性规范的重要作用。正如著名科学社会学家 B. 巴伯在其名著《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对逻辑的这种功能所强调的：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在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化建设中，特别是建设民主与法制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能没有逻辑精